余明同志谈“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杭州访问的录音）

罗宗明整理

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四川青救）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七·七”抗战爆发前后，黎储力（张黎群）、肖泽宽、董仲平三同志从上海经西安到延安。董留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黎、肖二人带着“西北青救”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先回到成都。董仲平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才回成都。当时中共中央青委在延安，它与各地联系不方便，主要是通过设在西安的“西北青救”与各地青年救亡组织发生联系和指导工作。黎、肖二人与“西北青救”的组织联系人是谢华，通讯联系人是西安师范的蒲望文。西安《救亡》周刊与成都《救亡》周刊互相交换学习参考。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出狱后，到处找党组织，找过成都业余读书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海燕社、成都民先队等，但都不是党组织。黎储力、肖泽宽到成都后即来约我（当时我在成属联中读书），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文件，虽然当时思想上没有“青救”这个概念，但发现这个组织更接近于党的组织，就把他们看作C.Y，并认为这是新时期C.Y的组织形式，于是我就积极支持这个组织的建立，叫他们多约一些人，只要赞成抗日，不管在团体不在团体都可邀约。我们邀约的大都是从上海回来的大、中学生以及海燕社、民先和学联的成员。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在一个同志家的二楼大厅里（记不清姓名和地点了），召开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参加成立会的有黎储力、肖泽宽、胡道南（由上海转学川大）、杨汇川（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杨真贤（搞音乐的，后去万县）、徐天宇（川大）、张文澄、沈荫家（华大）、许承信、刘承惠（林珈）、周平、王德琼（李白蕾）、吴德让（川大）、洪润芳（现名洪泽钧）、王世焕（川大）、徐坚（川大）、杨毓同（成公中学）、贺遐令、邱淑云，和我等三十多人（熊复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上成立了七、八个部，并进行分工，以便分头开展活动。

青年部　　王世焕　后沈荫家
学生部　　余　明
联络部　　黎储力　（张黎群）
宣传部　　胡道南　后张文澄（？）
出版部　　肖泽宽　后王世焕
总务部　　洪润芳
聘请顾问　　刘中莹（某中学教员），以后是廖文彬。

“四川青救”下面建立了两个群众团体：

一个是“大众读书会”。由杨汇川负责，参加的大部份是女同志。如王德群、周平、陶慕苏（贵州人）、崔××（职业学校教书）、杨毓同（杨静）、王涛、邱淑云、吴××（我介绍去延安的）、刘承惠（林珈）等。男同志有薛舟明、高××、何郝炬（一九三七年冬去延安）等，还有两个职业学校的教员。以后又吸收了成都生活书店的诸度凝、张文星等五个人（我曾领导该支部）。这个读书会的成员总共约二、三十人，其中少数是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大众读书会”每周开一次会，我则每会必去，实际上是领导这个读书会。它没有固定的活动地点，都是在同志们的家中。

稍后，各救亡团体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都纷纷改名为抗敌宣传团，“大众读书会”也改为“大众抗敌宣传团”，设在杨汇川家的客厅里，由张成仁任团长。这时，大众抗敌宣传团就可以公开上街和下乡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了。记得有一次在西玉龙街（？）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把群众团拢来以后，杨汇川便绘

声绘色地讲述了“法帝国主义侵占越南后，法国人竟把越南人当马蹬，踏上马之后又一脚把越南人踢开的当奴隶的悲惨命运。”接着就大声急呼地说：“中国人民必须起来抗日，决不能当亡国奴！”在场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我和张黎群先后介绍了七、八个“大众”的会员去延安。

“四川青救”领导的另一个群众团体是“救亡周刊社”。“四川青救”成立后不久，便仿照“西北青救”的作法在成都创办了《救亡周刊》，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出刊。《周刊》的前三期由熊复主编，后因熊复转移工作并准备去延安，改由王世焕主编，我也参加审稿和编辑。但我的重点是搞组织工作，张黎群搞联络工作。为了有一个固定的阵地，便于组织联络、发展社员和培养救亡骨干，特成立“救亡周刊社”。社址先设在祠堂街靠公园河边一间房子楼上，后迁至街对面的一家店铺楼上，我和张黎群常在那里。

楼下设赁书部，由“救亡周刊社”的社员搜集、募集和购买的进步书刊出赁。以这个赁书部做抗敌宣传和联系群众的工作，效果很好。赁书部开始由谁负责已记不清了，后来是江启明同志负责。以后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由刘熔铸同志负责，还有廖萍（女）也协助过。

开会和接待外地的同志都在楼上进行，如宋徽青、肖章銮等都是在那里与我接的头。曾发现有一对姓王的夫妇，经常坐在“救亡周刊社”的店门口，我们下乡宣传、演出他们也跟着去，后来发觉是特务，就把他们甩掉了。不久，“救亡周刊社”也和“大众读书会”一样改为“救亡抗敌宣传团”。

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抽出力量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及建党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合并为“星芒救亡联合周刊”；同时，大量吸收新党员。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救亡周刊”与“星芒报”又分开各自继续编辑出版。“救亡周刊”开始只有一、二

十人，完全是自己出钱办刊物，发行量从八百份增至一千二百份左右，发行范围包括隆昌、万县、新津、灌县、邛崃、贵州遵义（仅此一地即有15份左右）等省内外各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联络点。

“四川青救”与“西北青救”只有通讯联络，并无政治性文件往来，更不是领导关系，但介绍革命青年去延安却是由他们转送的。我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是从吴玉章同志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学得的。这个报刊先由上海转寄，后由香港转寄。

“青救”是秘密组织，它与“民先队”也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但“民先队”骨干如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林珈、洪润芳和我等，都是“四川青救”的成员。“民先队”也知道有“四川青救”这个组织，那时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是存在的。有一次张文澄同志拿着成都文艺界救亡协会筹备组的名单来，要求“四川青救”按照暗线显示的名字投票选举。“四川青救”认为应参加两、三个同志进领导班子。可是选举结果没有“青救”的同志。于是，曾对张文澄等产生了误解。我与王世焕、张黎群商量之后，召开了“四川青救”各部负责人会议，我们提出“现在的形势既然有民先队这样一个大组织，我们可以不必另立旗帜，四川青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反正有些同志是民先队员，解散后各自参加民先队的活动。”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宣布解散“四川青救”。事隔两三天后，又避开了张文澄、沈荫家、许承信三同志，重新召开“四川青救”会议，并进行了新的分工，因而“四青川救”照样活动，依然存在，这是“民先总队”不知道的情况。当时，我还担任“民先”第二区队队长，洪润芳为区队委员，另一委员是川大的尹志祁。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同志回四川建党，并统一领导四川抗日救亡运动。十一月，邹、廖二同志抵成都，廖先住在西御街一个旅馆，找到张黎群和我（张与廖见面后

约一周左右，便离开成都去延安），半个月后，搬至春熙路青年会所属的旅馆。我去廖志高处，竟意外地见到了邹风平（我们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富顺牛佛渡开川南中心县委联席会时认识的），一周后恢复了我和廖文彬（刘光弟）、江启明的党籍，我们三人建立了临时支部，廖文彬任支书。邹风平直接领导我们，首先给我们讲政治须知即党的新路线和新政策，以及党员须知、支部工作、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一个多月后，我把“四川青救”中的骨干分子分别吸收入党，成立了“四川青救”支部，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我改任“青救”支部书记，撤销了临时支部。“青救”支部直属省工委领导，每次开会廖志高同志都来参加。

中共四川省工委建立后，邹风平任书记，廖志高任副书记。当时，省工委又下设工委、学委、妇委、文委。学委于一九三八年二月成立，由韩天石（书记）、康乃尔（组织）、余明、王世焕（宣传）和徐坚（委员）五人组成。我和王世焕、徐坚参加省工委学委工作后，“四川青救”党支部便撤销了，洪润芳任成公中学党支书，我兼任成属联中党支书。不久，徐坚调离，由张文澄为学委委员。五月，韩天石调中共成都市委任书记，康乃尔任学委书记，张文澄任组织部长，我仍担任宣传部长。学委领导成都各学校党支部和学生运动。这期间，川大的文法两院、协进中学、天府中学、中华女中、省师、成公中学、成属联中的学生党支部最为活跃。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抓了三件大事：

1。川大国民党CC、复兴社等反动势力捏造“稻草案”，企图打击我党在川大的组织及所领导的救亡运动，集中火力攻击康乃尔、王怀安（川大救亡团体的领导人，但尚未入党）。学委召开会议，认真讨论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阴谋陷害活动，并配合法律手段，终于获胜。

2。一九三八年三月（韩天石尚未调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省工委决定派张文澄等赴武汉参加全国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在一九三八年党中央三月政治会议之后）。会后，他们回到成都，进行了广泛的传达，进一步鼓舞和掀起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记得当时韩天石曾对我说，本应派我去参加全国学代会，因为我是学委宣传部长，考虑到不能离开学校太久，所以才改派张文澄去参加。

3、一九三八年六月，组织领导全市学生救亡团体欢迎国际学联代表柯乐满等五人的活动，省工委学委决定由我和张文澄负责，当时华大的周曼如，协合中学的陈××出力最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派某大学校长到飞机场欢迎国际学联代表并致欢迎辞，以后又允许公开活动等。国际学联代表访问和公开讲演等活动，对成都的学运影响很大。

省工委学委成立后约四个月，为宣传和推动全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展舆论阵地，“四川青救”就着手筹备将《救亡周刊》扩大改组为《战时学生旬刊》（简称“战学”）并于五月二十日在祠堂街九十六号正式出版。学委书记康乃尔出主意，通过上层关系聘请戴传贤、陈炳光、向传义等六人（以后又增加何其芳，曹葆华等）为名誉理事作掩护，使敌人和中间分子摸不清我们的政治背景。“战学”成立时，本来决定由王大明（即陶然）任社长，但实际是由康乃尔负责全面行政工作，我领导“战学”的党支部。《战学》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它既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内容，也有知识性的内容。常异同志撰写国际论文、时事论文。最后两页是请华大文幼章教授和×××（通过华大周楠找的一女同志，已记不得姓名）编撰英语知识（抗日救亡的内容）。蒋汇泽（明明）、王世焕（林青）、李亚群（小亚）和我（非我）等经常为它撰写文章和诗作。李亚群同志就曾以小亚为笔名写了《战时情书》，描写以前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操，十分生动，鼓舞人心。蒋汇泽的文章也较多，大部分是谈青年思想及救亡理论方面的。另外还有以诗

歌、剧本、快板等形式出现。一九三八年六月，李亚群同志调泸县建党，刘炎接着任主编。一九三九年调走刘炎后，由王元担任主编，直到一九四〇年。《战学》的发行量达两千至三千份，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

由“救亡周刊社”改组扩大为“战时学生旬刊社”，除以原来的“救亡周刊社”及其赁书部为基础外，新增加了川大、中华女中、协进中学、建国中学等三百多同志参加了该社。“战学社”内有党的支部，由我分工领导，吴德让作支部书记，刘炎、董仲平作支委。九月，我去武汉大学学习后，刘炎任书记，洪润芳、董仲平作支委。杨静（杨毓同）入党后，也参加支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七月撤销学委后，“战时学生旬刊社”的党支部改属成都市委南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余中。

“战学社”也成立过“战学抗敌宣传团”，经常组织社员上街下乡（主要是星期天）搞歌咏、话剧、街头剧等救亡宣传活动。在社内组织救亡理论、大众哲学、抗战形势等学习。还成立了木刻组，由王大化负责（原天津人美出版社社长郭钧即是当时开始学的，已死）。由王大化教唱歌曲，并成立了歌咏组。还有戏剧组，我与王大化就共同演了一出话剧，主演是谢持，剧名大概是《铁捧捧》。

“战学社”在当时学生救亡组织中是影响最大、最有声势的一个团体。有一次，贴出海报，公开欢迎军训同学归来的欢迎会，国民党政府派员来制止。当时是康乃尔和我负责，便与派来的人员做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但他又不敢违背上面指令。康乃尔趁他处于矛盾之际，便请他到隔壁房间招待烟茶并进行谈判。我便马上将会场改为圈形的联欢会形式，我主持会议，还讲了十几分钟的话，并用唱歌的声音作掩饰（王大化还唱了苏联的歌曲）。在会议间歇中由同学们自由发言。整个会场十分活跃，但不像开会的样子，国民党的派来的人员也无可奈何而去，我们则胜利结束了。

“四川青救”联系的群众（包括青救成员）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十几个骨干分子。一九三八年二月省工委学委成立后，“四川青救”、“民先”等原领导的群众团体，均划归学委、文委直接领导。

～～～

忆抗战初期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

洪　沛　然

一九三六年底，我们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由邓初民、张志和、张秀熟等分头联系，在成都成立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有马哲民、黄松龄（朝阳大学）、熊子骏（川大），还有董长安的兄弟，是在德国学过经济的留学生，那时在川大作教授。继后川大的黄宪章和车耀先、帅昌书、刘披云都参加了“座谈会”。到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邓初民收到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一张传单，他便在“座谈会”上提出来，说我们应该响应上海市文化界的号召，在成都也发起这么一个组织，把文化界团结起来。大家都很同意。在开始向各个方面联系、酝酿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过程中，张秀熟同志起了主导作用，他的主意也出得最多，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见。

既然要搞这么一个组织，那么应当怎样搞呢？我们拿起本子，到处去征求发起人。由于我们的工作，参加“座谈会”的人逐渐扩大。我们征求发起人，就由参加“座谈会”的人分工。以后，我们把“座谈会”的地址从张志和的公馆迁到了“努力餐”，以便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每到礼拜，我们以“聚餐”为名，在那里座谈。车耀先把“努力餐”那个“红烧什景”改名为“统一大菜”。（胡景祥同志说，车耀先还在《大声周刊》上大登他这个“统一大菜”的广告。）

筹备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签名运动的分工，记得是：由邓初民负责与朝阳大学的教授联系，熊子骏负责川大的教授，张老（秀熟）负责与他认识的一些成都中学的教师、校长联系。我那个时候课程不多，又会骑自行车，在课毕之后，就跑到各个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找校长、教师签名。那时一共有三百多人签名，包括川大校长张真如，还有当时的名教授如谢文炳、李相符，还有从上海回成都的名作家，如沙汀、周文等。中学校长签名的就多了，除了教会学校（如华美女中）和比较反动的省成中校长胡宇光、以及较为保守的树德中学兼成都县中的校长吴照华没有签名之外，其它的中学校长基本上都签了名。签名的时间是在暑假。当我们正准备开成立大会时，七七事变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一发生，成都的救亡情绪更高涨了。我们计划开学后再开成立大会，到那时学生就比较多。

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发起人当中，教育界的人比较多，但也有文化界的。如前面所说的，著名的沙汀、周文等，还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

那时，张宣是很得力的，他是一个闯将。我们和救亡团体联系，主要是靠张宣。

在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之前，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复兴社是既不参加，也不公开反对。这主要是因为七七事变已经发生了，它怎么好公开反对？省党部口头表示支持，但采取消极态度（陈子舆那时在省党部）。CC开始是消极的，但到了我们签名运动之后、成立大会即将召开时，CC突然积极了起来。这个时候的CC是在孟寿椿的领导下（孟寿椿那时是川大秘书长），孟虽然签了名，但开始时一点也不积极。后来看见我们签了三百多人的名，他一下子就积极起来了。他的目的是想夺取救亡协会的领导权，以便由CC来控制这个团体。临到开成立大会的前两天，他突然开了一张两百多人的名单，这两百多人都是川大学生，是CC的。由于邓初民那时已是老头子了，干实际工作的还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孟寿椿突然积极起来以后，我和张老（秀熟）、车耀先、张宣就研究怎么办，因为我们不能让CC控制救亡协会的领导权。那时有一个好条件，就是成都的抗日救亡团体很多，我们很有基础，于是就动员所有的革命团体在开成立大会那天都参

加。我想，既然是我在负责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组织工作，就要很好利用这一点——凡是我们的人，都要发票。另外，在选举执行委员的选票上，我们把研究好的所有执行委员名单都按梯子形排好以后，就通知各个进步团体按这个梯子形划圈圈。开成立大会时，有八百多人参加，大会在纯化街国民党省党部礼堂举行，我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选票由我发，不时我还要去向我们的人交待一点事情。孟寿椿心中有他的算盘，想把我卡在主席台上，对我说："你坐下来呀！不要老是跑！"我说："有些情况他们不了解，我必须去。"孟寿椿却通过川大一个姓陈的CC分子和他联系。这个姓陈的在会上也很活跃。但选举结果，完全是按我们安排的名单产生了四十几个执行委员。这当中，我们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中间分子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而孟寿椿等右派人物只有很少几个。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川大的校长张真如被选上了，川大和朝阳大学的几个进步教授，都被选上了。李嘉仲、熊子骏、帅昌书、车耀先、张宣和我都是执行委员，而且占绝对多数。在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委之前，我们也进行了研究。最后，一共选出九个常委，有张真如、张秀熟、邓初民、孟寿椿、熊子骏、黄宪章、甘典夔和我。甘典夔是刘湘的财政厅长，为什么他也参加了呢？他是作为"武德学友会"的代表参加的。执委会的一切议案，都是由我们提。我们立的议案首先是扩大宣传，组织宣传队，包括学校宣传、农村宣传。当时我们是想借用宣传队的组织冲破国民党的统治，把成都的救亡运动推向高潮。这一段时间，我们主要依靠当时比较有基础的救亡团体，比如"群力社"、"星芒社"等等，而CC份子则采取消极态度，不参加任何救亡活动。

当一九三七年八、九月份成都的救亡运动在各宣传队积极推动下，很快推向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看到群众起来就怕了。到十月份，国民党省党部先是借口文化界救亡协会"不合法，没有登记"进行限制。同时，当川大以及一些救亡团体的青

年，为了扩大宣传，到飞机场去慰问民工，国民党CC分子就制造“贪污稻草”案，陷害川大救亡团体的负责人，要抓康乃尔，他跑掉了，把黄宪章抓去了，还抓了几个学生，从这时起情况就变恶劣了，这就是“飞机场稻草事件”。（张宣同志说，那时已经是十一月底、接近隆冬了，好几万民工，只有单衣和稻草，而且稻草也很少，民工冷得简直不行，有的民工已经冻坏了。我们去慰问时，发现了这个情况，于是向救亡团体募捐，《大声周刊》大声疾呼了一下，号召募捐稻草，让民工起码晚上能睡得暖和一点。我们这样一搞，就把民心得到了。当权者说我们是“煽动民工停工，破坏国防建设。”他们就用这个罪名把黄宪章抓了，还要抓康乃尔。康乃尔那时有一个朋友，是王惠安的女儿，给康送了消息，康就跑了。那次川大闹得特别厉害，反动文人还写了一篇《康乃尔吃草》的大字报，攻击康“破坏”川大学生会的选举，说他如何“贪污”，“贪污”了多少斤稻草。黄宪章被抓了以后，是通过上层统一战线的邓汉祥把他保出来的。

飞机场事件以后，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就逐渐转入低潮。开始是常委会开不起来，张真如不愿意召集；不少中学校长纷纷宣布退出，如建国中学的姚勤如；继之，执委会也不容易召集起来，剩下的不多，就是我和车耀先、帅昌书、张宣这些少数人。我们邀集了一批青年，跑到国民党省党部去闹，要求他们允许救亡协会活动，因为我们抗日没有错，当然是合法的。开始，省党部还接待，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理我们了，哪怕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

到了十二月份，眼看以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公开活动愈来愈困难，我们就请示当时中共临时省工委要求暂停活动，工委同意了。为了向社会陈述成都市救亡协会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并说明被迫停止活动的经过，藉以暴露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我曾写了个宣言，是铅印的（可惜现在找不到那个铅印的宣言了）。这个宣言散发了，报纸没有刊登，主要是那时国民党政

府控制新闻很严格，再则由于那时许多校长都在报纸上声明退出文化界救亡协会，说“文化界救亡协会是共产党操纵的”，报纸刊载也就有顾忌了

（吴启权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注：本文选自《四川党史研究资料》总第33期，本刊发表时，略有删改。

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犯上海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淞沪抗战在上海军民的英勇斗争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淞沪抗战，三月初日军在太沧、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双方于三月三日宣布停战，二十四日开始进行谈判，至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记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出川抗日救国活动

葛　诗　雄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独吞中国的野心，乘英、美帝国主义自顾不暇及蒋介石忙于“剿共”内战时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得寸进尺，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发出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党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了起来，东北爱国军民，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上海十九路军也奋起抗战，各省人民为爱国心所驱使，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旨，纷纷发起组织援东北义勇军，援沪义勇军，组织抗日敢死队、救护队，各学校的军事训练也迅速开展。

成都各界人民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参加运动的人十分广泛，有军政界、工商界、妇女界及各校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广大市民。从“九·一八”至“一·二八”以后，先后在成都成立了“成都市民反日会”、“四川抗日救国大会”、“抗日义勇军省总监部”、“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国民救国会四川各界民众促成会”，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大刀队，以及各种“反日会”、“反日团”、“抗宣队”、“国难乐输会”、“对日经

济绝交大会”、“经济绝交厉行团”、“肃清仇货委员会”等等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组织及活动，各界群众誓死救国的热情，大有杀绝东洋鬼子、踏平日本三岛之势。

然而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竟三令五申要取缔义勇军及抗日群众组织，镇压、破坏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人民绝不屈服于蒋介石和日寇的淫威，抗日群众运动仍然彼伏此起的不断发展，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我国领土，获得了伟大胜利。

今仅就一九三二年春成都抗日义勇军敢死队第一队出川抗日情况及其影响看四川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熱忱。

（一）成都敢死一队的建立

“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是“四川抗日救国大会”和“义勇军省总监部”成立后，在成都组织的义勇军敢死队的先头部队。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日，成都民众各反日团体合并组成“四川抗日救国大会”，以后多以“四川抗日大会”、“抗日会”的名义组织抗日活动。“抗日会”的主要成员有李璧泉①、徐获权②、郑元瑞③、胡寄窗④、周荣光⑤、罗觐光⑥、周儒海、冷曝东等。“抗日会”成立后，即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又成立了“四川义勇军总监部”⑦，罗觐光任总监，胡寄窗任总监部主任秘书、总监部委员有李璧泉、罗瑞麟、郑元瑞、孙壶东⑧、陈紫舆⑨、吕寒潭⑩等。总监部下设政训会和军委会，周荣光为政训会常务委员；陈紫舆、段少圭、文从周、郑元瑞、罗瑞麟、陈潜溪、李璧泉七人为军委会委员。

“四川义勇军总监部”成立后，推举罗觐光代表义勇军赴宁、沪与有关方面联系义勇军事宜，罗在返川途中，经汉口时被反共大将肖毅肃唆使人暗杀了，罗的死，对四川组织义勇军受到

很大影响。罗死后，“义勇军总监部””又积极筹建“义勇军敢死队”，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通告各县招募义勇军敢死队。通告一出，各方积极响应，仅成都市报名参加者，在短短二十天，即逾两百人之多。总监部一方面组建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作为敢死队的先头部队迅速出川抗日，另一方面，报名者多未受过军事训练，干部不够，又积极组织义勇军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由甘德民、⑪周儒海任训练班正副主任，并召集已登记的敢死队员训话，准备进行军事训练。

成都敢死队第一队筹备就绪后，“抗日救国大会”、“义勇军总监部”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敢死队有关事项：

一、修改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公约及章则；

二、由总监部资助敢死队每人旅费二十元、赠短服两套（以十五元为标准）；

三、敢死队宣传费暂定为二百元，由政训会制定宣传大纲；

四、电四川中委请接洽照拂；

五、电沿途军政长官照拂；

六、电国府及张、蔡、蒋三军长及上海抗日会等知照，并分赴前线工作。

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组成人员，须经“抗日大会”认许、及“义勇军总监部”负责人保证，必须有军事专长、或有政治工作技能、忠诚为敢死队服务，并能自备旅费至少二十元的。编成九人一组，两组十八人为一队，以示不忘九·一八。全队连同职员共二十七人，其中有女同志三人（两人任看护，一人武装）；有军事专长的十六人；有政治工作技能的六人，曾在党政军机关服务或从事教育；有工人二人。队长陈潜夫，队副刘宇春⑫，政治指导员兼文书徐获权，财务向竹修，宣传章楚桥⑬、龙泉，交际曾少杰、冯衡。

敢死队成都第一队于二月十八日发出激昂悲壮的第一次宣

言，宣言称："日本帝国主义者，持其暴力于上年九月十八日乘我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无故侵占我东三省，据我疆土，夺我主权，并尽其所能以淫劫烧杀我无辜同胞，犹以为未足，复于本年一月三十日，大举炸毁我东南京沪，近更封锁长江破坏各地，恶耗传来，同人等莫不悲愤填膺，誓拼生死。"宣言进而分析了倭奴敢于蔑视公理，绝灭人道，逞其兽行的原因，从而揭露日寇侵略我国的野心，"十年来倭奴加于我国的种种暴行及此次凶残的举动，固不仅图占我局部疆土，剥夺我部分主权，其用心实欲覆亡我国家，消灭我民族，以遂并吞东亚，雄霸世界的企图"，并大声疾呼："欲申人类的正义，谋世界和平与保国家安全及图民族的生存计，凡属国民，若非丧心病狂，均应一致奋起与倭奴作殊死战"。指出"所谓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毫不可靠，一人舍死，万夫难当，欲免灭亡，计唯自救，须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亡国之痛甚于亡家"。表示"同仁等抱誓死救国之决心，集合同志遄赴前方，直接与倭奴肉搏，国难不纾，决不生还，深望我全川爱国同胞一致团结，'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大家准备以鲜红的热血，去洗涤中华民族的耻辱，以无数的头颅去换取我中华民族的独立"。"最后我们的口号是：一、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二、誓死与日断绝国交，三、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四、誓死收复东三省，五、誓死反对上海设中立区，六、誓死与倭奴奋斗到底，七、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八、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宣言表明了敢死队的宗旨和誓死抗日的决心。

敢死队发表宣言的当天午后一钟，在省农会地址举行降重的授旗典礼，参加典礼的有陈书农市长及市党政军和各界代表与敢死队共约二百余人，李则民⑭主席，报告开会理由后，即由陈书农市长授旗授印，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受旗、印后，即领头宣读誓词，誓词如下：

"予谨以至诚，接受本军一切主张，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誓死救国，歼灭倭奴，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极刑，此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